



溯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研究

向德平¹, 刘欣²

(1.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从中国古代“教养兼施”的救助理念到坚持开发扶贫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扶贫道路模式,中国减贫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精神扶贫的思考和讨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传统济贫理念以及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扶贫思想溯源,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是摆脱贫困与提升脱贫质量的关键,要兼顾贫困人口与扶贫干部、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同时注重转变传统扶贫方式。在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系统回答了精神扶贫“为什么”“扶持谁”“扶什么”“怎么扶”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的内涵,拓展了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模式,为进一步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实践指引。

[关键词] 精神扶贫; 中国特色扶贫思想; 反贫困理论; 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20)01-0008-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推动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与此同时,由于扶贫主体、方式及对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加之越往后扶贫难度越大,中国现阶段脱贫攻坚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部分地区贫困人口缺乏内生动力,出现福利依赖的“等靠要”思想,或由于文化贫困、智力贫困而产生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等,成为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不仅影响脱贫质量提升和目标实现,也埋下了返贫甚至贫困代际传递的隐患。可以说,精神贫困越来越成为脱贫攻坚的一大阻碍。

事实上,精神扶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扶贫开发历史实践的产物,它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基础,根植于中国传统济贫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研究者

开始提出精神贫困是导致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推动了国家开展以“文化扶贫”“智力扶贫”为主题的精神扶贫工作。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习近平基于长期对扶贫工作的认识体悟,以及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一系列有关扶贫的考察、会议、讲话中不断提出精神扶贫、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等重要论断,阐述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意义,实施主体、内容、方法路径等,形成了一套丰富、系统、科学的精神扶贫观,推动中国精神扶贫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溯源:中国精神扶贫思想产生的基础与历史演进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形

[收稿日期] 2019-1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SH0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8M63009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22)

[作者简介] 向德平(1964—),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精神贫困的客观存在以及精神扶贫与物质贫困、生活贫困、文化贫困的关系,奠定了精神贫困的认识论基础。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指出其“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34-735}。“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158-159}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同时伴随着工人物质和精神的贫困积累,在贫困根源“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作用下,不仅导致了生产资料的贫困,也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工人不仅难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精神贫困的“局部的人”^{[1]743},也进一步影响到后代,形成精神贫困的代际传递。由于物质贫困造成的营养缺乏、教育缺乏以及居住环境恶劣,导致儿童智力发展缓慢,“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1]460},贫困家庭“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1]540}。由此,马克思将精神贫困引入贫困问题的讨论,不仅指出其客观存在,也深刻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论及反贫困时提出精神解放目标,并指出消除精神贫困、实现精神解放的道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消除贫困的“好日子”,就是要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实现经济解放;有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政治解放;以及精神舒畅,摆脱思想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思想解放^[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角度论述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创造消除贫困的政治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683}。同时,提供良好的教育设施和环境,全面发展智育、体育等,“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557}。

因此,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有关精神贫困的论述,为认识和理解精神贫困、探索精神扶贫提供了基本论点和方向,成为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济贫理念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以及改善民生的内在追求。特别是在儒家民本思想、佛教慈悲观念等影响下,推动了宗族、宗教及个人为主体的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这些为中国近现代减贫提供了借鉴启示,也成为当代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重要文化来源。

从文化溯源看,精神扶贫思想在一定程度承袭了传统“教养兼施”的救助理念。“教养”即“教”和“养”的合称,“养”是要实现人民衣食丰裕,“教”则表现为国家通过“教化”实现人民具有良好品性与行为的目标。孟子在其政治学说中提出“以教养二大端概之”,其中“教”就包括了兴建学校、崇礼正俗等,偏重对民众进行精神层面的礼仪和文化教育^{[4]220-222}。后世“教养兼施”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救助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意指在对贫民实施生活救助的同时,兼顾对其进行能力培训、思想道德教化与行为改造。特别是宋以来,不仅官办救助活动贯穿了“教养兼施”理念,宗族和民间慈善也践行了这一理念。如明末陈龙正举办的“同善会”,明确规定了受惠人的资格,“优先孝子、节妇等有德行而贫困之人”,不救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5]100}。这些提出了救济贫民的资格要求,也体现出慈善救助对道德败坏、精神贫困者的严格排斥。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文化冲击和社会变迁,“教养兼施”理念进一步推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6]。如晚清绅商经元善提出“课工教艺”主张,“不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堂”^{[7]246-247}。同时,他还倡导“开风气、正人心”的社会公益活动,创办“劝善看报会”、新式女子学堂等,以实现“扩充善念”,使众人“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达到“振刷精神,急起直追”以及“发愤自强,誓雪国耻”的目的^{[7]268-269}。及至民国举办的救济院,亦深受“教养兼施”理念影响。不仅要“授人以鱼”,暂时解决其生活,还要“授人以渔”,传授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养成其自立精神和谋生能力,并实行感化教育,纠正救助对象的恶习,最终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8]。此外,面对乡村普遍的落后贫困,梁漱溟等一批知识精英开展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也强调从文化、教育层面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这些主张实践虽发端于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的思考,实际也包含了传统教化观点,蕴含了扶智、扶志等精神扶贫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延伸以及基本的救助理念,“教养兼施”在推动解决经济意义贫困的同时,内在包含了启智扶志的精神扶贫维度,为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文化渊源与历史基础。

(三)历史演进: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扶贫思想

20世纪初,毛泽东在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中已经意识到精神文化贫困问题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在探索中国建设过程中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农民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观点,成为后续扶贫工作的基本理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论述中国发展和反贫困问题时,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9]116}。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抓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扶贫要先扶智;二是扶贫发展要以独立自主为前提;三是要敢于转变观念。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强调打破思想上的僵化,发挥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可以说,扶贫扶智、独立自主、转变观念等,就是要摆脱智力、文化以及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实际都体现了精神扶贫的意涵。

20世纪90年代,伴随开发式扶贫实施,江泽民在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扶贫思想进一步发展。在扶贫主体上,江泽民提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的“他扶”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扶”有机统一^[10],指出“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与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力量”^{[11]551}。同时强调了精神、意志的重要作用,“扶贫先扶志,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变苦熬为苦干,决不能因循守旧,封闭保守,望贫兴叹,坐等救济,年复一年,面貌依旧”^{[12]122},这些论断逐渐构成中国特色精神扶贫思想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胡锦涛将扶贫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布局,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13]851},“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前提”^[14]。同时将“坚持尊重贫困地区群众主体地位,把激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和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扶贫开发的内在活力”^[15]总结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条重要经验,并强调发展教育特别是教育救助的重要性,以保障困难群体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胡锦涛对于扶贫开发过程中扶志、扶智的阐述要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演进发展。

总的来看,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代表形成的中国扶贫开发思想中,蕴含了精神扶贫的深刻理念、观点和内涵。这对于当前推进精神扶贫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习近平精神扶贫观的丰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丰富与拓展

中国特色精神扶贫思想本质上是在中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往的开发式扶贫强调依靠贫困人口自身力量解决温饱、脱贫致富的重要性,当前,习近平基于其长期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探索、关注和思考,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精神扶贫的重要意义,系统回答了精神扶贫“为什么”“扶持谁”“扶什么”“怎么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推动中国精神扶贫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一)精神扶贫是摆脱贫困与提升脱贫质量的关键

习近平在探索农村工作过程中较早意识到了精神贫困及精神扶贫问题。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16]153}。同时,“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我们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方面把发展商品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来抓;另一方面把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一项战略目标予以重视”^{[16]149}。习近平不仅指出了实施精神扶贫、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摆脱贫困的题中之意,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剖析了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的辩证关系。

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进程中,习近平指出“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丰富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加强贫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精神风貌”^{[17]50};“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16]138}等重要观点,进一步指出了精神扶贫特别是摆脱意识贫困、思路贫困的重要意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做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实施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对于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升脱贫质量的重要意义。

因此,实施精神扶贫,不仅是摆脱贫困的题中之意,也是进一步提升脱贫质量,实现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决定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战略性和长期性。

(二)精神扶贫要兼顾贫困人口与扶贫干部

认识和理解精神贫困是实施精神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早期,习近平结合闽东调查工作实践,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的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16]2}。同时,他指出“贫困意识”不仅出现在贫困人口当中,也存在于扶贫干部当中。“我有个忧虑,就是‘贫困县’的帽子使某些人产生了不应有的‘贫困县意识’,影响脱贫工作的开展。”^{[16]68} 伴随扶贫开发进程的推进,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贫困群众精神贫困在文化、智力及教育上的表现,特别是精准扶贫阶段日益突出的精神贫困问题。“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18]137} “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认为‘扶贫是干部的事,反正干部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撤职’。”^{[18]140-141}

因此,从精神扶贫来看,“干部和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既要注重贫困对象的精神扶贫,又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他们积极探索,为他们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环境和条件”^{[17]51}。一方面,“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18]143}。另一方面,“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也需要转变扶贫干部思想观念,“淡化贫困县意识”,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攻坚克难,乘势前进”^[19]。

在此,习近平认识到贫困主体与扶贫干部存在的不同精神贫困问题,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偏重对贫困人口精神贫困问题的狭隘认识和偏见,从而指出不仅要扶贫对象精神之贫,也要解扶贫干部精神之困,拓展了精神贫困的内涵和类型。

(三)精神扶贫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核心内容。2012年习近平赴河北阜平考察时,就提出扶贫要扶志,强调有志气、自力更生的重要性;2013年在湖南考察工作时,又提出“脱贫致富重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18]132}等重要论述。随后,习近平不断提出“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等重要观点和论述^{[17]49},强调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把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作为根本举措,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自强自立、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信心,以及“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从而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形成脱贫光荣的新风尚。

同时,习近平特别强调发展教育、扶贫扶智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18]134}。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了文化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倡导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改变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贫困群众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民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18]142};地方干部则要“端正思想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18]143}。

因此,习近平强调以“扶志”和“扶智”改善强化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精神世界、文化水平和社会风气,正确处理外部帮扶与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以打破扶贫过程中的“福利依赖”以及贫困问题“代际传递”,也为探索精神扶贫实践提供了指引。

(四)精神扶贫要注重转变传统扶贫方式

习近平指出:“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各类扶贫项目和扶贫活动都要紧紧围绕贫困群众需求来进行,支持贫困群众探索创新扶贫方式方法。上级部门要深入贫困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要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瞎指挥。贫困群众需要的项目往往没有扶持政策,而明眼人都知道不行的项目却被当作任务必须完成。这种状况必须改变。”^{[17]50} 同时,针对“干部干,群众看”“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等现象,习近平提出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等方式,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积极性。2016年,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些地方虽然瞄准了贫困户,但还是老办法老路子,就是

简单的给钱给物,在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激活内生动力上做的不够,发展方式也没有真正转变”^[18]¹³⁸,因而提出要改变传统扶贫方式,注重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多采取以工代赈、生产奖补、劳务补助等方式,组织动员贫困群众参与帮扶项目实施,提倡多劳多得,不要包办代替和简单发钱发物。要加强教育引导,各地要办好各种类型的农民夜校、讲习所,通过常态化宣讲和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形式,促进群众比学赶超,提振精气神。”^[18]¹⁴⁴

总的来看,习近平着眼于不同类型的精神贫困现象,在强调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同时,也进一步反思扶贫策略,提出转变传统扶贫方式,构建更加综合性、多元化的精神扶贫政策体系,以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内源性发展。

三、价值: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的意义

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也是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论述的重要内容。总的来看,习近平关于精神贫困的思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等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精神扶贫思想,对于当前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稳定可持续脱贫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模式

中国在70年扶贫历程中,不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并在扶贫目标瞄准、减贫策略、扶贫理念模式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在此过程中,中国始终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相结合,扶贫开发从向贫困人口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发展到政策扶贫、投资扶持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相结合,并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入,以及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人力资本建设,逐步完善贫困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提升贫困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素质和能力^[20]。

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习近平着眼于摆脱精神贫困的核心要义以及实现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进一步反思现阶段扶贫工作,针对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有体力无能力”等内生性贫困问题,提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内生动力等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意义、对象、内容及实施手段。同时,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贫困发生的根

本原因、不同主体和不同类型的精神贫困问题、扶贫内力与外力的关系以及摆脱贫困的核心要义等问题进行分析,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精神扶贫思想,进一步拓展完善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新时期“造血式”扶贫方式转变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为推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实践指引

伴随脱贫攻坚进程推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精神贫困问题等成为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着眼于贫困主体和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精神贫困问题,提出从尊重贫困对象主体性,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层面实施精神扶贫,为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供了行动指引和路径选择。2018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不仅揭示了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意味着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现有贫困县全部摘帽,以及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也意味着提升脱贫质量,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以及逐步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贫困问题,包含了新时代精神扶贫思想所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16]¹⁴⁹。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扶贫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文化基础及演进历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脱贫攻坚过程中推动发展的精神扶贫思想,成为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最新进展,其不仅为当前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也将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进一步完善,推动中国构建更具综合性、人文性和可持续性的减贫发展策略,以中国特色扶贫方式回应世界减贫进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为世界减贫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王斯敏,张胜.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历史使命——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N]. 光明日报,2015-12-17(16).
- [4] 郑观应. 盛世危言[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5] 梁其姿. 变中谋稳: 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6] 黄鸿山, 王卫平. 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 [J]. 河北学刊, 2010(3): 73-80.
- [7] 虞和平. 经元善集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 [8] 黄鸿山. “教养兼施”的实践, 成效与困境: 民国浙江救济院研究(1928—1937)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182-190.
- [9]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黄承伟, 刘欣. 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3): 63-68.
- [11]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2] 李万禄. 跨越群山: 新时期贵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14] 胡锦涛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0(11): 71.
- [15]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胡锦涛, 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1-11-30.
- [16] 习近平. 摆脱贫困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9] 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 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EB/OL]. (2016-07-21)[2019-11-3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21/c_1119259129.htm.
- [20] 凌文豪, 刘欣.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念, 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4): 69-75.

(责任编辑: 赵歌)

Sourc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China's Ideas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XIANG Deping¹, LIU Xin²

(1. School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olog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idea of social salvation in ancient China to the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mbine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elf-reliance, a series of thoughts and discussions on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source of Marx's theory of anti-poverty,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 of poverty relief and the thought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of successiv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and discusses that the ideas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is the key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and cadres, combi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pporting the will and wisdom, and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s. In the new er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ideas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swers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nriched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expanded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provide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ideas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ti-poverty theory; poverty alleviation